

马克思主义在两湖地区早期传播的当代价值

李爱军

(湖南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南湘潭411201)

[摘要] 马克思主义在两湖地区的早期传播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成功范例,它对于推动和促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和大众化研究具有重要的启示和借鉴意义。文章主要从以现实问题为中心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注重培养和塑造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群体、注重构筑现代化的大众传播媒介系统和注重保障国家主流意识形态安全等四个方面诠释了马克思主义在两湖地区早期传播的当代价值。

[关键词] 马克思主义; 早期传播; 两湖地区; 当代价值

[中图分类号] A8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0755(2015)06-0041-06

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之始就已经开启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和“化中国”的双向过程。伴随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时代化的过程,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也开始了它自身的历史进程。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同其中国化和时代化一道“既深刻地改变了近现代中国的历史进程和发展方向,也从根本上重塑了中国人的精神世界”^[1]。马克思主义在两湖地区的早期传播^①(以下均简称“传播”)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区域传播,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标本”之一。马克思主义在两湖地区出场主要是通过两湖地区留学生群体、两湖地区及其两湖地区之外的报刊杂志和共产国际代表等传播渠道而输入的,其传播过程大致经历了马克思主义在两湖地区的启蒙传播、广泛传播和深入传播三个阶段。期间,马克思主义在两湖地区传播借助于多种媒介迅速传播开来,其主要内容有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剩余价值学说、阶级斗争学说、妇女理论和苏俄革命和苏联建设情况以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情况,等等。需要指出的是,与马克思主义在上海、北京等地传播相比较,除了一些共同特点之外,它具有自身的独特传播特点,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一是武汉国民政府时期,马克思主义传播短暂取得的正统合法地位为其在两湖地区广泛而深入的传播创造了有利条件;二是两湖地区涌现了一批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中坚人物,促进了两湖地区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群体的初步形成;三是通过书信、人际交往、人际交

流等多种传播方式进行马克思主义传播;四是两湖地区产生了多部在国内具有重要影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著作,并且多次翻印出版本地和外地相关的革命书籍;五是两湖地区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在马克思主义传播过程中互助合作和相互支持^[2]。可以说,马克思主义在两湖地区的传播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成功范例。因此,加强对该领域的研究对于推动和促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和大众化研究具有重要的启示和借鉴意义,其当代价值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 结合当代中国新的时代和实践,以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我们正在从事的事业为中心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创新,切实解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中遇到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难题

马克思主义传入两湖地区满足了当地社会“救亡图存”革命运动的理论需要。需要指出的是,两湖地区是当时中国社会外国资本主义和中华民族、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以及南方革命政府和北洋军阀政府等国内外矛盾的聚集地,具有全国意义的典型代表性。这就为两湖地区革命运动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思想武器,并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和当地社会实际的初步结合,产生了多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诸如《劳动政府与中国》、《马格斯资本论入门》、《阶级争斗》、《社会主义史》、《共产主义与智

[收稿日期] 2015-08-20

[基金项目] 湖南省教育厅一般项目“中国共产党早期湖南重要报刊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研究”资助(编号:15C0569)

[作者简介] 李爱军(1978-),男,河南卫辉人,湖南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博士。

识阶级》、《新民学会会员通信集》(第一、二、三集)、《社会问题概观》、《工团主义》、《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和《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等等。这些理论成果在当时加深了中国共产党(以下均简称“党”)对中国社会革命一系列基本问题的正确认识和客观把握。例如,田诚^②在《共产主义与智识阶级》中对中国社会性质作出了自己的研判,提出了中国社会的“公共半殖民地”性质论断。这与建党初期党对中国国情的认识相比进一步深化。建党初期,党认为中国革命是以无产阶级为主体的社会主义革命。这种认识是建立在对属于资本主义社会的性质认定基础之上的,这就完全割裂了对中国国情的认识。在列宁主义和共产国际的指导下,党对中国社会性质才有了比较正确的认识,提出了明确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并且作出了以国共合作的方式来推进中国社会革命的重大决策,但是对中国社会的革命性质、革命对象、革命动力、领导力量、革命策略等等还并没有完全搞清楚。因此,这还需要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国情相结合以进一步深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

与时俱进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品质,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和大众化的题中之义,也是它具有强大生命力的客观保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其大众化的前提,而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其中国化的归宿。这就需要根据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现实需要以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我们正在从事的事业为中心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创新,努力回答新的时代和实践不断提出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难题,不断丰富和发展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体系。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进入了“当代”视阈。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的实践带来一系列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难题。因此,我们亟需用马克思主义这个思想武器对此作出切实的理论回应,这就为理论创新提供了历史契机。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指出,要“大力推进理论创新,不断赋予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鲜明的实践特色、民族特色、时代特色”^[3]。我们知道,理论创新是要有一定的标准和特征的。有学者认为,创新的理论要考虑这些标准,一是该理论的问题背景和实践背景;二是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三是具有理论母体地位的重大理论问题或原则问题;四是具有理论“异端”的鲜明特征^[4]。按此标准来衡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可以说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程中最显著的重大理论创新成果。

尽管我们可以对马克思主义作出不同的理解和

阐释,但归根到底还是要解决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难题。这就需要从两个方面着手:一方面需要回答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难题,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科学的研究精神,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努力对当前亟需进行理论引导或说明的突出问题,作出科学的、有说服力的、符合实际的解释和说明。只有正确回答和指导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之中产生出来的难题,才能发挥作为国家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的威力和达到“理论掌握群众”的真正目的;另一方面,还要深入研究、“吃透”建国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本身,其目的就是要从这些实践本身当中总结提炼出符合中国实际的正确理论经验,以便于更好地指导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实践的发展。因此,我们只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新的时代和新的实践相结合才能不断地促使马克思主义“化”中国的过程,不断创造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最新理论成果,从而解决发展中遇到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难题。我们相信,马克思主义定会获得大的发展,正如列宁所说:“即将来临的历史时期,定会使马克思主义这个无产阶级的学说获得更大的胜利。”^[5]

二 注重培养和塑造具有深厚理论素养和丰富实践经验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群体,使其切实肩负起推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艰巨任务

马克思主义在两湖地区的传播之所以取得显著的效果,其中重要原因之一就在于马克思主义传播过程中促进了两湖地区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群体的初步形成。这是他们在具有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领军人物的带领下共同努力合作传播的结果。需要指出的是,他们虽然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皈依了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但在当时并没有完全掌握它。这与当时整体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理论准备不足有很大的关联。因此,要切实而有效地完成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任务,就必须建立一支高素质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理论队伍。这支队伍是宣传和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传播主体,其中包括各条战线上从事理论宣传工作的战士。他们首先必须具有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信仰,这是保持这支队伍具有战斗力的关键所在。按照传播学“把关人”理论来分析,他们是信息传播之前信息的“把关人”、“看门人”或“守门员”。他们有权“对信息进行选择、决定取舍、

决定突出处理及删节哪些信息或其中的某些方面,决定了向传播对象提供哪些信息,并试图通过这些信息造成某种印象”^[6]。毛泽东曾经说过:“在担负主要领导责任观点上说,如果我们党有一百个至二百个系统地而不是零碎地、实际地而不是空洞地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同志,就会大大地提高我们党的战斗力量。”^[7]在这支理论队伍当中,尤其需要重视的是专门从事理论研究的人员。鉴于此,为了增强这支理论队伍的战斗力的战斗力,首先就是要培养和塑造具有深厚理论素养和丰富实践经验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群体,特别是那些从事各学科理论理论工作的理论家。这是决定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能否实现重大理论成果创新的关键所在。恩格斯曾经说过:“一个民族要想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8]

与马克思主义在两湖地区的传播相比,在当代中国,推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外部环境及其条件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诸如有强大的国家政权作为后盾、有完备的现代化大众传媒体系等等,但是其传播效果并不是很理想,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于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力和感召力在下降。这是一个很值得思考和引起重视的重大现实问题,它关乎到党和国家能否兴旺发达、繁荣昌盛、长治久安。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就是国家主流意识形态坍塌,从而导致社会主义事业失败的最好例证。其实,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其影响力和感召力的反映,但是其影响力和感召力“恰恰来自‘学术研究的马克思主义’与‘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的统一性,马克思主义本身就是这二者的完美结合”^[9]。然而,在当代中国,“学术研究的马克思主义”和“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都不同程度地存在问题,如东欧剧变、苏联解体所导致的社会主义失败引起人们对马克思主义是否是真理性理论体系的质疑等等。有学者指出,作为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在满足利益诉求、提供精神寄托、产生价值共鸣、形成情感认同等四个方面形成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认同。但是在这四个方面当中,“现阶段(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主要依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和它给人们带来的现实利益,保持了一定的吸引力”^[10],而在提供精神寄托和形成情感认同等方面都存在不少问题。因此,在这种情况下,亟待提升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魅力和现实的吸引力。对此,我们急需注重培养和塑造具有深厚理论素养和丰富实践经验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群体,加大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创新研究,使其切实肩负起推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艰巨任务。

鉴于此,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要“深入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建设充分反映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的学科体系和教材体系,培养造就一大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特别是中青年理论家”^[11]。

三 结合当代中国新的时代和条件,注重构筑现代化的大众传播媒介系统,大力传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切实注重和提高马克思主义传播效果

马克思主义在两湖地区传播之所以效果显著,这与其多种传播媒介的协调推进分不开,诸如有创办或利用进步刊物,创建进步社团、书社(店)或学校,书信往来人际交流,利用马克思诞辰、列宁诞辰、十月革命周年纪念等各种纪念活动以及通过发动自治运动、工人农民学生运动等媒介。除此之外,还通过农民协会、群众集会和合作社等传播媒介传播马克思主义。尽管存在传播媒介多样化的鲜明特点,但是它们比较单一、凌乱,并没有形成系统化的大众传播系统,这不可避免地带有当时那个时代的痕迹。马克思说过:“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12]由此可见,“理论掌握群众”是“理论变成物质力量”的前提条件。要想达到“理论彻底”状态并不是那么容易,它并不是一个简单的认识过程,充其量只会不断达到接近真理的程度。在当代中国,“理论掌握群众”的历史条件发生了深刻变化,这就意味着开放条件下“理论掌握群众”的过程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不可能靠简单利用某种或多种传播媒介就能够顺利完成的。在当代中国新的时代和条件下,“它的实现会受到经济全球化浪潮、网络信息化、意识形态领域的复杂化等的冲击,同时又会受到我国社会经济发展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的困扰,还会受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接受主体在认知水平和认知能力上存在着不同层次的影响。”^[9]对此,恩格斯早在1890年致康·施米特的信中批评当时德国的一种不良倾向——把唯物主义当作标签随心所欲乱贴,对此不作深入研究时所说的那样,我们必须“重新研究全部历史”,“研究各种社会形态的存在条件”,“然后从这些历史条件中找出相应的政治、司法、美学、哲学、宗教等等的观点”^[13]。因此,当代中国,世情、国情、党情、民情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这就需要我们

中构筑与此相应的有效的现代化的大众传播系统,推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追求马克思主义传播效果的最大化。需要指出的是,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重点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但不能就此说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需要大众化,当然也包括自马克思主义创立以来所有的理论成果。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指出,要“开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宣传普及活动,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3]。

在当代中国,随着网络信息化的快速发展,网络、手机、数字媒体等等被誉为“第五媒体”的各种新兴媒介不断涌现,带来了传播媒介的深层革命,彰显出以报刊、杂志、广播和电视等为主的传统媒介与各种新兴传播媒介相互联合的趋势。除了大众传播媒介以外,还存在人内传播、人际传播、群体传播、组织传播、国际传播等多种传播媒介。信息传播媒介的多样化成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提供了便利条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信息可以通过各种传播方式在任何时间、以任何方式传播并分享给受众群体,从而使马克思主义呈现出日常存在和存在形态的多样化。需要指出的是,“我们党提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要求,当然有普及马克思主义特别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意思,但这并不是让普通大众都来‘信仰’马克思主义,而且事实上这也是不可能的,而是让马克思主义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进入和成为公众的意识,成为大多数中国人的话语、知识、观念、信念和经验。所以,尽管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过程中,也不排斥部分民众信仰或信奉马克思主义,但是就多数人来说,它主要是让公众了解、知道和他们的社会生活相关的主流思想,从而有助于他们的社会行为和生活。”^[14]但不容忽视的是,信息传播渠道的多样化也带来了信息的多样化,这就对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带来巨大的压力。显然,信息的多样化有助于开拓视野、活跃思维、解放思想。如果没有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指导的主导性思想的支撑和引领,人们就会在信息多样化的框架里迷失方向。因为“没有正确的政治观点,就等于没有灵魂”^[15]。因此,马克思主义要想在众多的信息当中脱颖而出就必须占领思想舆论传播的制高点,因为“大量事实证明,思想文化阵地,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的思想不去占领,各种非马克思主义、非无产阶级的思想甚至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就会去占领。”^[16]当然,这个制高点的占据不能单单靠国家利用政权、意识形态理论说教等方式来取得,而是要通过比较、对话等形式来取得自身的优势地位,特别

是在开放条件下急需要通过构建中国特色的话语体系来展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性和现实性,从而获得广大人民群众的真正认同和信仰。

四 坚持用马克思主义国家意识形态引领社会思潮,注重加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切实而有效地维护国家意识形态安全

如前所述,马克思主义在两湖地区的传播取得了显著的效果,重要原因之一就是促进了两湖地区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群体的初步形成。这些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在皈依马克思主义信仰之前,大都经历了一个蛹变成蝶的“思想大杂烩”的过程,最终选择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的终身精神依托,诸如湘鄂籍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和恽代英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转变就是其典型性的代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并非是一个单纯的出于理论兴趣的偶然事件,而是为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实践所包含的非单独性存在的“跨文化传播”的复杂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马克思主义是被夹杂在自由主义、民主改良主义、无政府主义、空想社会主义等各种社会思潮的名号之下传播开来的。瞿秋白曾明确回忆道:“社会主义的讨论,常常引起我们无限的兴味,然而究竟如俄国十九世纪四十年代的青年思想似的,模糊影响,隔着纱窗看晓雾,社会主义流派,社会主义意义都是纷乱、不十分清晰。”^[17]周扬对此也曾回忆说:“五四新文化运动给我们带来了科学和民主,也带来了社会主义新思潮。那时我们急迫地吸收外来的新知识,一时分不清无政府主义和社会主义,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的界限。尼采、克鲁泡特金和马克思当时几乎是同样吸引我们……。”^[18]马克思主义从众多社会思潮中的一种思潮中间变为一种运动,最后成为一种社会制度,逐渐占据了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的支配地位,成为一面吸引人们不断为之奋斗和牺牲的旗帜,其本质在于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真理。

在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国家意识形态领域受到经济全球化、网络信息化、经济市场化和西方和平演变分化的新的影响和新的挑战。习近平指出:“经济建设是党的中心工作,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19]在中国的政治及思想文化领域中,已不可避免地导致了价值多元化趋势的出现。在马克思主义国家意识形态之外,新权威主义、新左派主义、新自由主义、新保守主义、新利己主义、新儒学主义、后现代主义、民主社会主义、历史虚无主义、犬儒主义等各种社会思潮此起彼伏,层出不穷。由此导致的结果必然是人们的思想活动受各种思想或

思潮观念相互影响相互激荡的渠道明显增多、程度明显加深,其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差异性明显增强。在这个过程中,马克思主义国家意识形态趋于弱化、淡化,非主流意识形态也发生了大的分化,呈现出“一主弱多元竞争”的复杂态势。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劳伦斯·布拉姆对此曾明确指出:“中国已从意识形态主宰一切、不存在任何物质主义的状态,转变为物质主义至上、不讲任何思想意识和价值观的状态。人们有所期望成为了普遍的现象。现在大家谈论的是‘用什么品牌’。”^[20]试想,如果认为当代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只要能给人们带来商品消费主义的物质实惠而不需要再讲什么意识形态,那么,就等于自动放弃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其后果是相当严重的,就必然会导致我国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坍塌和整个国家意识形态的失序和混乱,从而引起民心浮动和社会动荡,以至于断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和丧失党的执政地位。因此,在当代中国,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只能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社会主义国家意识形态,坚持和加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一元化地位,从而转变当代中国社会政治及思想文化领域“一主弱多元竞争”的态势为“一主强多元服从”的崭新局面。

实际上,任何一个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总是那个社会的统治阶级的意志在思想体系上的现实反映,并在其社会意识形态领域当中占据主导地位。“特别是在社会价值多元纷呈的社会,更需要有一种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才能做到这些多元价值的‘和而不同’,在它们之间保持合理的张力,使其不发生彼此对立和冲突。”^[21]在当代中国,全方位开放条件下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国家意识形态地位,就必须深入认识马克思主义本身的历史命运,认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历史关系,从中摸索出总结出规律,从而找出正确的对策。对此,就首先要找到定位坚持、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正确坐标,这个正确的坐标就是对科学社会主义学说一脉相承且与时俱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也就是说,必须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来引导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建设和发展,从而确保国家意识形态的安全。对于各种社会思潮,必须坚持用马克思主义来引领。但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一元化的指导地位并不意味着完全反对和拒斥各种社会思潮。我们还需要保持清醒的政治头脑,从中吸取有利有用的养料,充实丰富和补充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指出:“我们既反对盲目接受任何思想也反对盲目抵制任何思想。我们中国人必须用我们自己的

头脑进行思考,并决定什么东西能在我们自己的土壤里生长起来。”^[22]因此,在全方位开放的条件下,必须坚持用马克思主义国家意识形态引领社会思潮,注重加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切实而有效地维护国家意识形态安全。

注释:

① 关于“早期传播”的起止时限划分是一个有待学术界统一的问题,本文暂定在1912至1927年这段时间。

② 学界对《共产主义与智识阶级》文章的作者田诚是谁的考辨至今仍然是一个有待破解之谜,但是不能否认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

[参考文献]

- [1] 赵铁锁,肖光文.十七大以来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研究述评[J].毛泽东思想研究,2009(4):152-156.
- [2] 李爱军.马克思主义在两湖地区早期传播的若干特点[J].毛泽东研究,2015(2):109-114.
- [3] 十七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26.
- [4] 杨凤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程中理论创新的标准与重大创新成果[J].教学与研究,2007(4):24-25.
- [5] 列宁.列宁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08.
- [6] [美]威尔伯·施拉姆,等.传播学概论·传播学名词解释[M].陈亮,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1984:2.
- [7]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533.
- [8]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437.
- [9] 张雷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多重研究视角[J].马克思主义研究,2011(7):56-61.
- [10] 朱兆中.意识形态的传播与接受问题研究——兼论中国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与接受[J].上海行政学院学报,2007(4):12-21.
- [11] 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1.
- [12]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1.
- [13]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87.
- [14] 刘建军.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在当代中国的多重文化身份[J].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3(1):33-38.
- [15] 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226.
- [16] 江泽民.论党的建设[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438.

- [17] 瞿秋白. 瞿秋白文集:第1册[M].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53:53-54.
- [18] 周扬. 文艺战线上的一场大辩论[N]. 人民日报, 1958-02-28.
- [19] 习近平.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M]. 北京:外文出版社, 2014:153.
- [20] 木子. 现代中国人遭遇期望危机[N]. 青年参考, 2006-02-24.
- [21] 余源培,陈宝,郭友聪. 开放条件下巩固和加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研究[J]. 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 2006(2):5-14, 85.
- [22] 毛泽东. 毛泽东文集:第3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6:192.

The Contemporary Value of the Early Communication of Marxism in Hubei-Hunan Area

LI Ai-jun

(*Hun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Xiangtan 411201, China*)

Abstract: The early communication of Marxism in Hubei-Hunan area is the successful example of the popularization of Marxism, having an important enlightenment and referential significance in instructing and promoting the sinicization, modernization and popularization of Marxism. This article explains the contemporary value of the early spread of Marxism in Hubei-Hunan area mainly from the following four aspects: promoting the innovation of Marxism theory on the real problem; paying attention to cultivate and shape the group of Marxism theory; building a modern mass media system; paying attention to protect the national mainstream ideology security etc.

Key words: Marxism; the early dissemination; Hubei-Hunan area; the contemporary value